

中華文化的特色與魅力

金達凱

一、前言——中華文化在近代的曲折歷程

中華文化的研究和討論，現已成為海內外中國知識階層和世界學術界同表重視與關注的課題。中華民族孕育產生了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凝聚發展了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的前途，繫於中華文化的提升與傳佈；中華文化的發揚光大，亦有賴於中華民族的興盛昌隆。二者有不可分的密切關係。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據近代考古資料表明，中華大地出土的新石器時期的文物，已具有原始文化的雛形及特徵。經過三代的發育，文化思想和文物體制已燦然大備，由孔子集其大成，從而形成先秦時代的輝煌文化體系。此後兩漢、魏晉、隋唐宋明各朝代，一脈相承。其間雖有南北朝的對立，有五代十國之分裂，以及蒙滿部族之入主中原，影響文化道統之傳承。但胡族之漢化，對儒家思想價值之認同，邊疆部族先後融入漢族社會，成為中華民族之一員，同時擴大了中華文化對邊遠地區的普及。

中國傳統文化在歷史長河中奔流不息，百世所宗，至晚清始發生觀念上的變化，傳統價值觀有所動搖。因為近百年來，中國社會之變革，西方工業文明興起，經濟政治軍事勢力向外擴張，中國打了敗仗。於是引起西方人士對中華文化之輕視；另一方面我國社會對固有文化失去信心，進而形成反傳統文化的思潮，「五四」運動為第一個高峰。

「五四」運動原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運動，以維護國權，保護國族利益為前題。而世界任何愛國主義和民族

主義者，總以肯定和宣揚本國和本民族的歷史文化為精神上的支持力量，少有看不起自己、乃至譴譏本身歷史文化的愛國主義者。可是當日運動的領導人物，無論是標榜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右派，或是強調社會主義的左派，彼此的思想雖存在分歧，卻都對中國歷史文化採取否定態度。雖有民主與科學的訴求，而其重點則是「打倒孔家店」。某些學者由「全盤西化」或「充份世界化」、「整理國故」，進而掀起「疑古學風」，既懷疑古代歷史人物的存在，又懷疑古代典籍之多屬偽造。這些「懷疑論」，既談不到對新文化的建設，也談不到對固有文化之整理，祇是造成一種歷史虛無主義，製造文化思想的混亂而已。王國維先生曾感嘆指出：「疑古之過，並堯、舜、禹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份之處理也。」【一】

其後，左翼勢力興起，在歷史唯物主義主導下，不承認宇宙精神，不承認人類思想意識產生的精神價值，因之亦不承認由宇宙精神和人類思想意識所形成的歷史文化。不過早期毛氏的態度較為持平，一九三八年他曾指稱：「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可是當其建立政權後，便拋棄前言，對大陸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與無休止的迫害，對大中學校實行「課程改革」，取消原有傳統思想與文化課程。特別是「文革」時期的「破四舊」和「批孔揚秦」運動，對傳統文化展開無情的攻擊。這是中華文化在近代又一次遭受更大的挫折。

在此情況下，五十年代流亡海外的文化人，感於去國離鄉之痛，懷於中華文化面臨的危機，因之對固有文化有所反省，對「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之否定儒學、否定倫理和德治思想，造成對國家和社會的負面影響，有所反思；發表一系列具有正面意義和建設性的文章，因而對世道人心產生正本清源、除雜歸真的作用。一九五八年初，他們基於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聯合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二】，指出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三種動機、道路及其缺點，說明中國文化對精神生命之肯定，中國哲學思想在中國文化之地位及其與西方文化之異同，中國歷史文化所以長久之理由，呼籲世界人士，應把人類前途問題，共同當作一整體問

題來處理，以求各民族文化價值之保存與發展，進而互相依存、互相欣賞、互相融合，達到天下一家之境界。

經過三十餘年的耕耘傳播，以港台為基地的新儒學學術價值，已獲得大陸學術界的迴響，得到國際學術人士之肯定。國際學術界，近若干年來，深入研究中國近代傳統派及保守派思想和事跡，發現他們在傳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表層之下，包涵著一股自由及創新的精神，而他們對中國現代化的實際貢獻，和自由主義者乃至西化論者並不相上下。這個結論推翻了過去數十年來國際學壇的流行見解，修訂了「自由——保守」或「創新——傳統」的機械二分法。

【三】所以現代某些新儒家，可稱為「創新的傳統主義者」。

另一方面，大陸當局，鑒於長期政治運動對人們精神生活之折騰，特別是「十年浩劫」對黨內外精英之迫害，痛定思痛，於七十年代後期推行「改革開放」方針，放鬆思想領域之限制，於是大陸學術界也興起研究傳統文化的熱潮。八十年代以來，曾數次舉行中華文化研討會，又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舉辦「孔子及儒學國際討論會。」【四】雖然大陸學者的意見尚有分歧，與海外學界的觀點尚有差距，但對於倫理道德並未排斥，承認孔子思想至今仍具有若干現實意義的成份，對海外新儒家之成就也有若干好評。這較之過去時期那種偏激心態，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也表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學思想仍保有旺盛的生命力，歷萬千劫仍能生存，遇逆流仍會前進，創造了世界文化史上之一奇跡。

二、中華文化的特色

當前世界各古老文化已告銷亡，唯中華文化綿延不絕，屹立於世；其原因當由於中華文化有異於其它古老文化的特性。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說明，從文化比較上來看，中國文化具有極強的個性。這包括：（一）中國文化獨自創發，慢慢形成，非從他受。（二）中國文化自具特徵，自成體系。（三）中國文化同化力強，能包容吸收外來文化，而不為外來文化動搖變更。（四）自西漢以來二千餘年，中國文化較少改變，顯示其自身內部具有高度調和性，

中華文化的特色與魅力

已臻於文化成熟階段。(五)中國文化非唯時間綿久，且空間亦大，對四週有廣泛影響。東亞諸國皆在其放射圈內。而歐洲近代文明，肇始於中世紀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則得力於中國造紙及印刷術等之傳習，以為其物質基礎。又如十七八世紀之啟蒙時代與理性時代，亦得力於中國儒家思想之啟發，以為其精神之來源。

這些係就一般特點而言，或係外在現象而言，至於內蘊似未提及。現筆者僅就精神思想方面略加補充，以透視中國文化的特色。

(一)中國文化具有廣袤的內涵，然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為骨幹。儒家思想重視人性之發皇，人格之尊嚴與修養。對外主張禮樂之教化，立身處世重視義利之辨，重視倫理秩序之建立，增進家庭和社會的和諧，使社會進步為文明社會，國家提升為禮義之邦。在這種思想的薰陶下，中國歷史上雖有朝代更替，乃至有異族統治，但民間基本上仍能遵守傳統的觀念、做人的道理，中國始終是一個文化的古國與大國。

(二)中國文化的政治思想，是德治主義，為政以德，實行仁政。仁是道德觀念，通俗地說，是對人、對事、對物都有一份溫情，對事物的處理，能有合理的成份。在社會發生災變或戰亂之餘，當政者多注意與民休養生息，減輕民間負擔，以恢復社會生機，為民族生存發展創造條件。

(三)由於中華文化內涵的博大，因而養成民族性的寬容，雖有「夷夏之辨」，但不是種族成見，亦非地域觀念，而是文化上的先進與落後之分。祇要文化上認同，禮義不墮，則無論蠻夷戎狄以及遼金蒙滿，都是中華民族成員。民族的寬容性，又展現為思想上的融和性。儒道學派固可並行不悖，即外來宗教亦有傳教和信教的自由。歷史上雖有「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及唐武宗)毀佛之事，但不久「毀者盡復」。清初禁教，後亦開放。不同宗教之間，亦能和諧相處。過去大陸農村，常有寺廟、道觀、教堂比鄰而居，平安無事。這與歐洲中世紀殘酷宗教戰爭和迫害異教徒情形，完全不同。

(四)中國文化意識重視歷史，「六經皆史」，表明經史之間不可分。尤其從「史記」起，由「漢書」到「明史」，

有二十幾個朝代正史，如加上「新元史」和「清史稿」，有二十六史。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民族保有像中國這樣豐富、完整、二千餘年連貫不斷的歷史記錄。還有「通鑑」、「通典」、「通志」、「通考」、「會要」、「實錄」以及地方志書如「省志」、「府志」、「縣志」和各族姓宗譜、個人墓誌、碑刻等。這樣龐大和多種類的史書、史料、史論，既便於歷代文化的保存，也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凝聚與蕃衍。

(五) 中國文化基本上是人文主義，歷代王朝重視士人，長時期來，組成以士人為骨幹的文官政府，因而減少了貴族政治和武人政治的弊病。而自唐宋以來，因科舉考試，引進和吸收了大批地方文士，寒士參與政治活動，在專制政體中，開放了平民知識份子參政的渠道，有利於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地方文化之交流。所以世界上還沒有其他古老文化能夠在數千年的長時期未曾間斷地持續下來。另一方面，當日不少名士學者在政治上成就一番事業之後，告老還鄉，回到鄉村去，或閉門著述，或興辦書院，設帳授徒，守住民間的文化防線，也發生了阻撓異族或暴政破壞文化的作用。

(六) 歷史上，中國社會沒有明顯的階級對立，財富較少集中。其原因有三：一是自秦以來，井田制解體，土地自由買賣，人人得而有之。二是遺產諸子均分，而非長子一人繼承之制。三是過去社會大地主較少，小農和自耕農為多。又因資本主義發展較遲較慢，亦少資產階級。這與西方中世紀土地屬貴族領主，近代工業屬於資本家的情況，亦不同。

(七)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憂患意識，儒家經典多有敬畏和戒懼之情。朝乾夕惕，居安思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種憂患之念，不是消極悲觀，因為悲觀會使人喪失奮鬥向上意志。亦不同於恐怖，恐怖會將人之自身交付外在不可知的神力。而憂患意識則要求人們本身掌握自己的命運，對前途的責任感，不斷省察自己對此責任之實踐，以策勵對此責任之完成。另一方面，則消除逸樂怠惰心理，養成刻苦耐勞，奮發進取精神。老子也說：「兩軍相對，哀者勝矣」。這哀兵必勝、驕兵必敗的道理，也正是由於有無憂患意識與戒懼之心而來。可以說，中華民族之危而不倒、險而能安的歷史過程，表現了文化憂患意識的正面意義。

中華文化的特色與魅力

(八) 中國歷史文化，是在和平安定中發展，在戰爭動亂中倒退。和平是常態。動亂是變態。「和為貴」，為國人的共同信念。因此，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除少數暴君外，一般獲得政權後，無不與民更始，休養生息，偃武修文，以求安定，恢復社會生機，從而綿延民族生命，推動民族文化之發展。

(九) 中華文化思想，不借助邏輯思辨與推演能力，不運用宗教形式與信仰，祇是通過德性之修養與仁義精神之把握，以追求「內聖外王」之境界，達到「經世致用」之目的。所以文化的浸潤力，不僅滲透社會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而且植根於廣大社會的基層，廣泛深入民間的土壤。雖販夫走卒，匹夫匹婦，沒有文化水準，卻能在日常生活中，家庭和社會關係上，能體會和遵奉儒家的立身處世原則。「禮失而求諸野」，正是此種文化精神之顯現。

這些特色，充實了中華文化的活力，調適了內在的機能，也注入和壯大了中華民族的生命力。這是中華文化能受各種挑戰與考驗，與世界其它古老文化不同的地方。也是中華民族老而不衰，生命堅強的基本因素。

三、中華文化的魅力

中華文化具有上述各項特色，因而產生了不少獨特的魅力。約略言之。有以下數種。

其一、是對民族的凝聚力。中國民族由華夏、漢族為主體形成博大的中華民族。是經過不斷的融合，逐步同化而成。如上古迄先秦，融入了夷、蠻、戎、狄等部族。自秦漢南北朝，又融入了匈奴、鮮卑、氐、羌諸族。自隋唐至元末，匯合了契丹、女真、黨項、蒙古諸族。由滿清入關至近代，又繼續融和了滿、藏、回、維、苗等族。至目前為止，據大陸統計，中華民族的大流內，共有大小五十六個民族，其中始終以漢族為主體，不為不斷融入的新流、支流所分散和取代。這表明我國博大民族的形成，不是依靠武力之征服，亦非中原統治勢力之擴張，而是文化上的同化。亦即中華文化的凝聚力。

這種凝聚力，可分兩方面：一是無形文化，即華夏氏族祖先之德性，或者說是仁愛的精神，消除了其他部族的

敵意，發生了感化和潛移默化的作用。二為有形文化，即「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這種共同經濟生活、共同精神生活縮短了部族間的距離。而孔孟思想、儒家學說，對邊疆民族之感召與融合，更有不容忽視的功用。一九六九年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的唐墓中，有唐中宗景龍四年（西元七一〇）抄寫的「論語鄭氏注」讀本，墓主是十二歲的義學生卜天壽。可見當日邊疆地區兒童是以「論語」為啟蒙讀物，也就加強了漢化的效果。

其二、是學術思想上的融通。儒家主張「道並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先秦時期，各學派既相互爭鳴，亦互相影響。而魏晉玄學更是儒道思想的合一。當日清談的「三玄」，是周易和老莊，是將道家的人性自然論和儒家的綱常名教結合起來，構成玄學的理论基礎。可以說，玄學是儒道的混一體，二者並無排斥的現象。

其後，佛學亦融入中華文化體系之中。佛教自東漢由印度傳入中土，為適應中國社會的特性，亦求與中國文化相契合，於是進行體質的轉變，提出「儒佛一體」、「三教同源」之說。天台、華嚴、唯識各宗固然注意與儒道思想相結合，而表現最好的則是禪宗。其「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的理論與儒家的「天人合一」觀念相符。其揚棄「漸悟」，提倡「頓悟」，與孔孟「我欲仁，斯仁至矣」、「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提法，基本相同。同時宋明儒亦受佛教思想影響，以心性之學為核心，構成理學或道學的系統。美學者羅斯（E.A. Ross）說：「古代中國文化，富於同化力量，景教入中國，不久寂然；猶太人入開封，亦失其語言宗教。或謂中國如大海，凡流入之物，無不溶化，此說誠然。」這種學術思想的寬融性，正是中華文化的又一魅力。

其三、是文物的豐富。中國經歷戰亂災變，文物多有損失，但國家和社會個人迄今仍有不少館藏與收藏。除北京故宮博物院及有關省市博物館的藏品外；僅台北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一年清點統計，該院藏列的國寶級文物數量有六十四萬五千七百八十四件（冊）之多，若以單件計算，則有七十萬件。還不包括歷年接受社會人士寄存故宮文物二萬餘件【五】。

至於流落國外的重要美術品，如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洛神圖」，唐代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像」，吳道子的「送子天王像」等，則被英美等國收藏，已非我所有。但也由於這些極品的外流，使西方畫壇感染中國的風格，畫面不求形似，不拘對稱，結構自然，線條流動，所謂「中國風」(Chinoiserie)已普及法、英、德、意等國美術領域，一七七六年以後的美國亦受這種中國風的影響。【六】也當是中華文化魅力對西方藝術的感染。

其四、甲骨學和敦煌學成為世界顯學。就甲骨學來說，據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統計，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五十年中，研究甲骨學而有論著的作家，共計二八九人。其中，本國二三〇人，外國五十九人。又從一八九九到一九八〇年的八十年間，殷墟甲骨共約出土十六萬片，目前大陸二十四個省市、三十九個城市、九一〇個學術單位，共收藏甲骨九萬片，而散佈海外者約七萬片。所以甲骨學已成為世界的顯著學科。

至於敦煌學之成立，敦煌石窟之揚名於世，除了現存塑像兩千餘軀、壁畫四萬五千平方公尺外，還有一個更豐富的文化寶藏——「藏經洞」存有五萬卷以漢文為主體的手抄本和刻本。這些寫本，上起西晉永興二年(三〇五)，下迄北宋咸平五年(一〇〇二)，除部份佛經、儒家經典、道家及雜家書籍外，有地志、圖經、邊防資料、戍卒生活、土地契約、戶籍、信札以及詩文、音樂、歌詞、舞蹈、戲曲等。還有邊疆民族史料，有吐蕃、突厥、回鶻、梵文和西域各國的文字文書。這些文物史料除北京圖書館收藏者外，在國外，巴黎和倫敦博物院、俄羅斯彼得格勒博物館等均有收藏。所以「敦煌學」亦為當前世界的顯學。

其五、周易走向世界。周易為儒家六經之一，原為我國古代卜筮書，以卦象為主要內容。後經「易傳」的闡釋，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統一的整體，將天地人三者作有機的統一，使周易脫離卜筮範疇，深入哲學的領域。並對天文、曆法、數學、史學、文學、醫學、政治、倫理、樂律、建築、軍事等方面都發生影響。自十七世紀傳到歐洲後，又引起西方科學家的重視，而與自然科學相結合。又自本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世界學術界掀起「易學熱」，成立「易學研究會」【七】，或舉行國際易學研討會。而現代南韓的國旗，也採用八卦圖案。不難看到中華文化代表之一的易

經，在國際的崇高地位。

其六、中國古典詩詞對東亞諸國的影響。我國傳統文學，以古近體詩的地位最高，最富魅力。自三百篇始，歷經楚辭、漢魏樂府、徒詩、唐宋至明清詩詞各個階段，經過長期發展，最後定型下來的一種幽美文學形式。到今天，海峽兩岸、海外華人社會，不僅有相當數量的讀者，且不斷產生優秀的詩詞作者。而自六朝隋唐以來，西域和東亞來華的僧侶、使者和學生，在學習中國語言文字時，不忘學習詩詞寫作。於是將詩詞藝術帶回本國。

在亞洲鄰近國家中，對漢學最感興趣者，首推日本。當歷史承平時時代，他們上自君臣，下至士庶，多以誦習漢詩、寫作漢詩為風雅、為時尚。例如宏仁十四年（八二三）日嵯峨天皇巡遊賀茂神社，開設花宴，命侍臣作詩，詩題是賦七律「春日山莊」，宮廷上下皆有唱和。嵯峨本人還摹擬張志和的「漁歌子」詞五闕，內親王有智子及大臣滋野貞主亦有和作【八】。至明治時代（一八六七——一九一二），日人對中華文化之吸收，對漢文學的學習研究，更加積極。當日著名詩詞作者，有日下夢香、野村篁園、山本鴛梁、森槐南、高野竹隱、德山樗堂、北條歐所、森川竹蹊等，其中尤以森槐南為傑出。

朝鮮（南北韓前代）方面，因與中國僅一山（長白山）一水（鴨綠江）之隔，兩國關係更為密切，熟識漢文，研習漢詩詞者代不乏人。高麗王國詞人李齊賢的詞作最為出色【九】，頗能表現詞學的意境與藝術。

越南詩詞學堪與朝鮮相比，其代表者可推阮綿審（一八一九——一八七〇），號椒園，又號白毫子（因眉間有白毫），越王朝宗室，著有「北行詩集」、「倉山詩鈔」、詞集「鼓柁詞」等。夏承燾氏認為他的詞，風格在白石（姜夔）、玉田（張炎）之間，評價甚高。饒宗頤教授在「清詞與東亞諸國」大文中對阮詞亦有評介。【十】這些是研究中華文化魅力之不可忽視者。

四、中華文化若干誤解的澄清

近代中外人士鑒於近代（清代民初）中國國力之衰弱，對外戰爭之挫敗，以及現實政治、社會結構之缺乏現代化，因而產生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之低估。

首先提出批評的，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係為專制王朝服務，缺少民主的自覺與民智之要求。當然，在綿長歷史過程中，個別或部份知識份子屈於政治的權威，向皇權臣服，自難以避免。但是儒家思想和理論，則是「天下為公」、「有德者居之」，尊敬仁主，抗拒暴君。推崇堯舜禪讓，肯定湯武征誅。「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春秋大義，是「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十一】在人格上認為君臣是對等的，「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並以民意反映天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重民輕君，以民為本的思想，與近代的民主觀念，有相似之處。老子亦有「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之說。所以儒道兩家經典中找不出主張為專制暴君服務的論據。

其次，近代某些學者對傳統文化常加上「封建文化」的稱號，因有人指出「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佔統治地位服務的文化，則是封建文化。」其實，這種說法有商榷餘地。

中國古代雖有封建制度，但無封建社會組織形態。這種封建制度，大致是在西周至春秋之間，周王朝在取代殷王朝之後，將自己的宗族親信分封各地，由王室分封諸侯，由諸侯分封卿大夫，於是諸侯有侯國，卿大夫有采邑，這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與西洋中古史上蠻族入侵，羅馬帝國崩潰，農民和小地主尋求保護，向地方強有力者投靠，成立各種契約關係而形成的封建社會形態，有所不同。到了戰國，因平民學術興起，民間知識份子參與政治，削弱了貴族勢力，推翻了貴族世襲特權。又因井田制度之崩潰，土地不再是貴族的采邑，封建制度逐步瓦解。以後科舉盛行，平民由考試踏入仕途，門第也隨之消滅。直至清末，在社會上無顯著階級之分，在經濟上自由買賣，與西洋中世紀地主的莊園制度亦有所不同。所以「封建文化」一詞，政治宣傳成份居多，並無史實的依據。

其三、有些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重視經濟，重士而不重商，以致防礙了現代化。但是先秦儒者反對的是巧取豪奪，反對不義之財；正常的經濟活動並不反封。孔子大弟子之一的子貢，就是「結駟連騎」的大商人。史記貨殖列傳就記錄了不少古代工商人物資料。在理論上，儒家重視養民、利用厚生，主張藏富於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重視公平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主張勤儉節約，反對浪費，「生之者眾，食之則寡」、「為之者急，用之者舒」，都是合理的經濟原理。近年西方學者研究「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長，認為台灣、新加坡、香港主要是華人，南韓亦與中國文化關係密切，所以四者經濟上的成就，應是受到儒家思想之影響。同時台、新、南韓因有強鄰壓力，求生意志堅強。香港華洋雜處，競爭激烈，港人亦有危機感。這些正是儒家的憂患意識。所以「四小龍」的經濟表現，不能否認沒有儒家思想的動力。而中國較長時期未能現代化，可能與戰亂及政局不穩等因素有關，並非傳統文化的阻滯。

五、結語

由上述各項以觀，可知中華文化並非封閉、僵化的文化，有相當的適應性、開創性；並能吸收外來文化，以充實豐富本身的生命力。除早期對佛教和邊疆民族文化之融和整合外，而近代天主教傳教士如利瑪竇、湯若望、鄧玉函、艾儒略、南懷仁等之將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火器、輿圖、測量等科學知識引進中國，均受到朝野之歡迎，亦能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又如唐代流行的音樂、舞蹈、樂器等，不少是自西域傳入。郎世寧的繪畫，亦有中西合璧之美。而現代西方文學藝術，亦廣泛融入中國社會之中，漸漸成為中國文學藝術的一部份。所以中國文化並非固步自封，而是吸收異質文化的同時，並不拋棄本身的歷史傳統。這當是中華民族萬古常青，中華文化永不枯竭的基本因素。

再者，中華文化現成為海峽兩岸和海外華人社會的共同語言，共同認定的價值標準。未來中國之統一，必須以文化意識為基礎，維護歷史文化為前提，同心同德，開創二十一世紀的新局。

中華文化的特色與魅力

附註：

【一】王國維「古史新証」（清華研究院講義）

【二】此項宣言由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四位先生署名，唐先生執筆。稿成，徐先生曾提兩項意見：第一、主張將中國文化精神中可以與民主政治相通的部份疏導出來，以推動中國的民主政治。第二、認為不必強調中國文化中的宗教意義，因自春秋時代起，中國文化逐漸從宗教意識中脫出，而在人的生命和生活修養中實現。但唐先生接納第一項意見，第二項則未接受。

【三】蕭欣義「一位創新主義者的傳統觀」——「徐復觀文錄選粹」編序（台灣學生書局）。

【四】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瞭望週刊」海外版。

【五】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中國時報」。

【六】虞君質「藝術論叢」（香港前亞洲出版社）。

【七】據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香港《文匯報》轉載紐約《世界日報》消息：最近美國易經考古學會對一批在世界各地出土、刻有中國上古易經卦象的古物進行鑒定。這些古物是從中國大陸、美洲、南太平洋、歐洲等地區蒐集而來，在一千多件古物中，有三百餘件與易經卦畫有關。其中一件係古希臘遺存的「陶盆河圖」，底部有中文古篆銘文。證明在商末周初，中國文化已傳入希臘地區。

【八】滋野貞主主編奈良朝以來詩文集「經國集」。

【九】夏承焘選校「域外詩選」（河北書目文獻出版社）。

【十】饒宗頤「清詞與東亞諸國」——「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一】史記太史公自序。

（本文係作者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及大陸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聯合主辦「中華文化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所撰論文）